



大家小书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

郑振铎 著

非外借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

郑振铎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 / 郑振铎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7. 7

(大家小书)

ISBN 978 - 7 - 200 - 12902 - 1

I. ①唐… II. ①郑… III. ①唐宋词—诗词研究②五代词—诗词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3282 号

总策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乔天一

责任印制 宋 超 邝 天

装帧设计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

大家小书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

TANG WUDAI LIANGSONG CI SHIGAO

郑振铎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190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2902 - 1

定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大家小书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乔答摩的降生



敦煌绢画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

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导 言

陈福康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郑振铎是发出“要求一本比较完备些的中国文学史”呼吁的第一人^①;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很早就从事中国文学史的撰著工作。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共出版过四种中国文学史(或与中国文学史有关的)专著:一是《文学大纲》四大册的中国部分(按,《文学大纲》实际是史上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其中约四分之一篇幅写的是中国,已有学者指出,《文学大纲》中国部分若独立出来,实是一部体系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如此,我认为此书的中国文学部分,实际还是一九二〇年代国内最优秀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二是《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②一册,为断代史性质;三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册,为通史性质;四是《中国俗文学史》二册,为分类史性质。总计字数约一百五十万字(《文学大纲》外国文学部分以及各书插图所占篇幅均不算在内),又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在新文学工作者中,以一人之力做出如上成绩的,没有第

① 见一九二二年九月《文学旬刊》上《我的一个要求》。

② 按即本书原书名。——编者

二个人。

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三部书,几十年来被众多出版社多次重印,学界几乎无人不知。而那本《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那是怎样的一本书呢?须从头道来。

郑振铎于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文学大纲》。边写边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其中有些补充章节则发表于《一般》等刊物上),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册于一九二六年底出版,接着郑振铎因大革命失败而避难欧洲,全书的跋即作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赴法国的远洋轮上。最后的第四册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出版的。应该说,在《文学大纲》写成和出版以后,郑振铎就产生了再撰著一部详尽的《中国文学史》的念头。一九二八年六月,他从西欧回国,应上海复旦大学等校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史。同时,继续主编《小说月报》。一开始,他已经公布要撰写一部《西洋艺术史》以供《小说月报》连载^①,但后来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欲望超过了写《西洋艺术史》,以至后者终于未能写出,而从一九二九年三月号《小说月报》起,开始发表《中国文学史》的“中世卷第三篇”。至年底,共发表了五章。最早发表的是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学》,文末有郑振铎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写的附记,说明此章是“去年九月间匆促写成”,可知他回国不久就开始《中

^① 见《小说月报》第二〇卷第一期《最后一页》。

国文学史》的撰写了。

这五章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郑振铎经过少许修订,于一九三〇年五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书名为《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作者在同年三月一日写的该书《后记》中说:“全书告竣,不知何日,姑以已成的几章,刊为此册。我颇希望此书每年能出版二册以上,则全书或可于五六年后完成。”从这里我们已可窥知原书计划之宏大。但是,这个“中世卷第三篇上”是什么意思呢?原书共拟分几册?由于全书仅出版此一册,后来作者在北平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计划已有更改,因此人们一直无从详知。一直到我在郑振铎遗稿中幸运地看见了他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此时该书已经付印)修订的《中国文学史草目》,方才解开了这个哑谜。

根据这个《草目》,我们知道郑振铎当时拟写的《中国文学史》,上下五千年,自上古(公元前三千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共分“古代卷”“中世卷”“近代卷”三卷。从上古至西晋末年为古代卷,共分三篇,每篇各一册;从东晋初至明中期正德年间为中世卷,共分四篇,每篇各二册;明嘉靖初至“五四”前为近代卷,共分三篇,第一篇三册,后二篇各二册。这样,全书共有十篇,约一百章,拟分十八册出版。大致估计,全书完成将有三百万字左右。这是何等气势磅礴的前无古人的文学史撰写计划!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完成。而其“中世卷第三篇”,内容是五代、两宋期间的文学史,

计划分上下两册,已出的此书即为上册。上册共五章,题目为:《词的启源》^①《五代文学》《敦煌的俗文学》《北宋词人》《南宋词人》。除了敦煌文学及五代文学中涉及的诗、散文等以外,主要讲的都是有关“词”的历史,正如作者在此书《后记》中说的,“这一册所叙者以‘词’为主体”。因此,尽管此书作为断代文学史(五代两宋文学史)也仅成半部,令人不无遗憾;但却颇有单独存在的价值——可以当作一部词史来读。(宋以后,“词”仍有一定的发展,但已趋衰落,影响小了。)

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已经提出,中古时期中国诗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即诗(近体、律体)的时期与词的时期,并将“自五代时‘词’之一体的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称作中世“第二诗人时代”。必须指出的是,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学大纲》的有关章节,对词史作了简明的论述后,关于这一特殊诗体的发展史的研究,几年来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在本书之前出版的其他各种文学史中,虽然也提到了词,但都很简略。曾在报上指出《文学大纲》几处小误,并称也对宋词研究深有兴趣的胡云翼,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了专著《宋词研究》,书中明确说明:“本书行世前,尚无此类专著”。胡氏此书约十万来字,除了通论部分外,主要是作家评传。胡氏此书有一定

① 今改为《词的起源》。——编者

学术价值,但作为通论、评传尚可,却显然不是一本“词史”。因为它主要是鉴赏、评述性质,而缺少历史观念。要论“词史”的话,我们其实不能不推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为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在郑著此书问世后,有关词史的专著才开始多了起来,如一九三一年出版了刘毓盘的《词史》^①,王易的《词曲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其第三册专论词与曲),一九三三年出版了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中国词史大纲》、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其下册专谈词),等等。但是,从史料的丰富性与立论的正确性等方面看,一九三〇年代出版的一些词史似均未能超过郑振铎这本书。

此书约有十七万字,其中专论词的部分有十四万字。(而《文学大纲》有关词的部分的文字,不及这一字数的十分之一。)本书论及词作者近二百名,引录词作约三百七十首,即使将这些词作单独抽出作为一本“词选”,也是相当丰富的了。由此可见本书的内容是相当详赡的。而在见解上,书中更有不少独创。

例如,关于词的来源,《文学大纲》未及论述,本书则认为有“两个大来源”,即“胡夷之曲”与“里巷之曲”,一个是西域来的,一个是取之民间的。作者不同意历来认为词是“诗余”

① 此书在一九二〇年代曾作为北京大学讲义,内部少量印行,约八万余字。

的说法,也不同意词是“古乐府的末造”的说法,认为这些说法“是完全违背了文体的生长与演变之原则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他指出:“词自有它的来历、它的发源、它的生命。”“它不是旧诗体的借尸还魂,也不是旧诗体的枯杨生稊,更不是旧诗体的改头换面。新诗体是一种崭新的东西。”它新就新在敢于大胆摄取域外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养料,因此就“与五七言诗大异其面目与性质”。关于中国文学接受外来影响与民间养料的问题,是当时的很多研究者所讳言或忽视的。郑振铎强调指出这些,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很有意义。本书第一章《词的启源》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著名词学家、郑振铎的小学同学夏承焘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①

关于词的发展,书中认为大致可分为四期。一是胚胎期,即“引入了胡夷里巷之曲而融冶为己有”的时期,这时的词是有曲而未必有辞的。二是形成期,即“利用了胡夷里巷之曲以及皇族豪家的创制,作为新词”的时期,“曲旧而词则新创”。三是创作期,即词作家“进一步而自创新调,以谱自

① 夏承焘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日记:“阅《小说月报》二六六号郑振铎《词的启源》,谓词与五、七言诗不发生关系。据《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句,谓‘里巷与胡夷之曲,乃词之二大来源’。又谓依腔填词,始于裴谈、温庭筠。以绝细腻之笔,写无可奈何之相思离绪,始为文人之恋歌,而非民间之情曲。余所见郑君文字,此篇最不苟者矣。”近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精选编集了一本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九年的《词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即收入郑振铎《词的启源》,并置于全书首篇。亦可见其学术价值。

作的新词,不欲常常袭用旧调旧曲”,这时的曲与词(辞)有一部分均是新创的。四是模拟期,即作家“只知墨守旧规,依腔填词,因无别创新调之能力,也少另辟蹊径的野心”,“词的活动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唐初至开元天宝时为词史发展的第一期,开元天宝至唐末为第二期,五代至南宋末为第三期,元初至清末为第四期。这是发前人未发的见解,与鲁迅后来关于词从兴起到衰落的宏观见解^①,在精神上颇为一致。郑振铎不仅从宏观上将词史分为四个发展期,在具体分析时他又将北宋词的发展与南宋词的发展分别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北宋词经历了从清隽健朴,到奔放雄奇,到循规蹈矩这样三个阶段;南宋词则经历了奔放,改进,凝固(雅正)这样三个阶段。他指出,这些变化跟词这一文体本身的发展规律、文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等有关;而且也跟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有关。例如,南宋词第二阶段以后渐趋僵化,就因为这时它“不仅与民众绝缘,也且与妓女阶级绝缘”,成为“差不多已不是民间所能了解的东西了”;这时的词失去豪迈的气概,也是当时统治阶级“升平已久”“晏安享乐”的社会现象的反映。郑振铎的这些分析与见解,体现了卓越的史识,已可略见唯物史观的星星光芒了。

书中通过独立思考,对胡适有关学术观点作了争鸣。例如,胡适据《杜阳杂编》,以为《菩萨蛮》调出于大中初,因

① 见鲁迅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致姚克信等。

此断定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决非真品。但郑振铎指出,《菩萨蛮》一调实已见诸《教坊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亦提到开元时即有此调,因此李白当然有填写此词的可能。虽然,这到底是不是李白所作,至今尚无定论,郑振铎也没有绝对肯定;但他强调指出不能用孤证来推翻一切他证,这显然比胡适要慎重得多。胡适还认为五代的词都是无题的,因为其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什么标题。郑振铎不同意这种皮相的看法,指出:“花间词人的作品,诚多咏离情闺思之作。然离情闺思之作,原是一切抒情诗中最多的东西,不独花间词为然。且这一期中,也不完全是离情闺思、宴席歌曲之作。”那么,为什么“无题”呢?他认为,这是词创作初期的一种现象,“大多数的词牌名,已是它们的题目了,它们的内容也和词牌名往往是相合的,所以更无需乎另立什么题目。”例如,当时《更漏子》写的便大多与更漏声有关,《杨柳枝》便与杨柳有关,《天仙子》便与仙女有关,等等。发展了一段时间后,词的内容与词牌不大切合了,但尚未完全离开词牌所含的意思,例如《渔父》,填词者未必直接歌咏渔家生活,但仍含有该词牌原有的鄙薄功名、甘隐江湖的意味。再发展到后来,内容与词牌没有必然的联系了,这时才必须另外再有一个题目。郑振铎的这些论述,显微烛隐,无疑比胡适高出一筹。

在具体作家作品分析评论中,书中也时有新见。例如,

关于王安石在宋词史上的地位,前人均无特别的好评,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也不过附带一说而已。但此书中不仅肯定他在政治上变法图强的精神,而且认为他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其词“宜乎气格与别的词人们不同”,盛赞其“脱尽了《花间》的习气,推翻尽了温、韦的格调、遗规,另有一种桀傲不群的气韵”,“无论在格式上,在情调上”,都“大胆无忌的排斥尽旧日的束缚”。因此,郑振铎认为,王安石在词史上的地位是“为苏、辛作先驱,为第二期的词的黄金时代作先驱”。这是非常独到的创见,郑振铎自己也指出,这是“很少人注意及之”的。书中对柳永的词作了十分细致的艺术分析,并将其与《花间集》作了艺术上的比较,指出《花间集》的风格在于“不尽”,“有余韵”;而柳永则在于“尽”,在于“铺叙展衍,备足无余”。他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境界,不好随便评其优劣;“但这第二种的境界,却是耆卿(柳永)所始创的,却是北宋词的黄金时代的特色,却是北宋词的黄金期作品之所以有异于五代词,有异于第一期作品的地方。所以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词,其特点全在含蓄二字,其词不得不短隽;北宋第二期的词,其特点全在奔放二字,其词不得不铺叙展衍,成为长篇大作。当时虽有几个以短隽之作见长的作家,然大多数的词人,则皆趋于奔放之一途而莫能自止。这个端乃开自耆卿。”这样精辟的分析,在当时其他论著中极为少见。不仅说透了柳永词的艺术特点,而且更进一步阐明了词从前期到黄金时期转化之际艺术风格上的变化脉络,以及柳永在其间所

起的作用等。

除了关于词史以外,本书关于敦煌文学的论述在当时也是开创性的。陈子展对此就有高度评价。^①在《文学大纲》中,有关敦煌文学只是极简单地提到了一句;虽然这是在文学史著作上较早的记载,但毕竟过于简略了。(这当然是与当时很多材料流失至国外后尚未整理与公开有关的。)而本书中却有近三万字的论述。对于敦煌抄本的整理与研究,郑振铎并不是国内外最早的学者;但他无疑是迅速吸取当时敦煌学研究最新成果,并较早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评价的人,而且他还是我国较早亲赴法、英等国去查阅有关原件的人。书中指出,敦煌写本中“在文学上最可注意者则为俚曲、小说及俗文、变文、古代文学的钞本等等”。(按,所谓“俗文”的称呼,后郑振铎作了纠正,详见下述。)并认为:“就宗教而论,就历史而论,就考古学而论,就古书的校勘而论,这个古代写本的宝库自各有它的重要的贡献,而就文学而论,则其价值似乎更大。”因为,第一,发现了许多已佚的杰作,如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的很多诗等;第二,发现了大量的俗文学作品,使人们知道了小说、弹词、宝卷及很多民间小曲的来源。“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绝大的消息,可以

① 陈子展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八章《敦煌俗文学的发见和民间文艺的研究(上)》之后,特地专门加了一段附记,指出郑振铎此书《敦煌的俗文学》一章,“是介绍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最详实而又最有见解的一篇文章”。并深为遗憾地说:“可惜我作文时不曾得着这篇文字作为参考材料,现在又来不及改动前稿了。”